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论欧洲共产主义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30
E 1
200

论欧洲共产主义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齐春子 胡尔湖 鲁亦冬译
吕建华 郭琳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11, 21.

论 欧 洲 共 产 主 义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著

齐春子、胡尔湖等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176,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3106·644 定价：0.84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封面设计：陈绪初)

本书献给我的两位堪为楷模的同志和亲密
的朋友：

阿尔封索·佩拉尔塔（“亚历杭德罗”）

于1977年5月在墨西哥被谋害

罗伯特·兰斯顿

于1977年6月10日在巴黎去世

目 录

前言.....	2
第一章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苦果.....	3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方面.....	37
第三章 东柏林会议.....	53
第四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新认识.....	66
第五章 卡里略的冲击.....	77
第六章 苏联的反应.....	86
第七章 东欧的反响	100
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	126
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	151
第十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189
编译跋	223

Ernest Mandel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First published as *Critique de l' Eurocommunisme*,
by Francois Maspero, 1978

© Francois Maspero, Paris 1978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78

© NLB, 1978

NLB 7 Carlisle Street, London W1

Second edition 1979,

Designed by Ruth Prentice

Filmset by Servis Filmsetting Ltd, Manchester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Lowe and Brydone Printers Limited, Thetford, Norfolk

Cloth ISBN 86091 005 9

Paper ISBN 86091 010 5

前 言

本书包括十篇论述欧洲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五篇写于不同时期，发表在《国际新闻通讯》杂志上(即第二、三、五、七、十章)。为了与本书其它几篇论文衔接，对这几篇文章曾略加修改。尽管这些论文写于不同的时期，但我们认为，它们有条理地分析了欧洲共产主义，包括欧共的历史渊源、欧共在当前西欧震憾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欧共与斯大林主义衰落的关系以及欧共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引起的反响。

埃内斯特·曼德尔

第一章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苦果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谈“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和对这一理论的批判。

1924年，斯大林详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曼德尔认为这一理论表现了苏联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保守性。这一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集中表现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成了苏联的工具；长期以来，苏联借这一理论推行其外交政策，打击反对它的共产党；今天这一理论又诱发出“民族共产主义”。

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推行了与资产阶级一体化等一系列新改良主义的政策，由于各国共产党自主性得到加强，加上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就打破了苏联是世界革命唯一堡垒的神话。许多国家共产党反对苏联的控制、铁托事件、中苏矛盾、苏共二十大、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等等，粉碎了苏联一贯正确的理论，造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危机。苏联侵略捷克招致了各国共产党的不满和谴责，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彻底衰落。

欧共一方面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又处处充当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欧共执行“和平共处”政策，

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由于资本主义欧洲长期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力、资本以及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欧共建立在一国基础之上的“逐渐改革资本主义”的计划就变成了空想。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只能陷入绝境。

欧洲革命必须以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目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团结一致，苏联已经完全背叛了这一宗旨。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需要有一个平等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中心。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势在必行。

——译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代表着一股强大的、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在欧洲，它拥有成百万成员。在各国的议会里，它占据了几百个议员席位。它动员起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参加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集会和游行。当时，它从社会上、政治上和心理上体现了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酝酿的大动乱的抵制。

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第二国际通过了一个极为明确的原则：“一旦战争爆发，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争取战争的迅速结束，并且不遗余力地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哥本哈根大会（1910年）和巴塞尔大会（1912年）也通过了类似的原则。^①确实，直到1914年7月27日，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还在

^① 既不是左派，也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饶勒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不去打我们的兄弟！我们不向我们的兄弟开火！如果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那么，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将会出现战争：那便是革命。”——作者注

郑重许诺：它们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反对战争。但是，到了1914年8月1日，所有主要的欧洲强国中的社会民主党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除意大利党保持中立外）。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以“保卫祖国”为借口，转而支持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掠夺行径——对于发动这次战争的资本主义列强来说，这次战争就是为了掠夺——并且，这种支持实际上是无条件的。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给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左派的打击是沉重的、难以消除的。这不仅是由于这个转变意味着更加彻底地与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多年来在客观上为阶级调和与“神圣同盟”铺路架桥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潮流妥协，而且是由于这个转变引起了深远的国际反响。

当然，无论是当时，还是其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社会民主党公开投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的变化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因为这种堕落本身是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化机构与资产阶级社会不断一体化的产物。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官员们既得利益的增加，终于使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中特权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促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气氛：在它的影响下，这些政党的最低纲领（迫切需求）与最高纲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日渐脱节。其它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缺陷无疑地也为1914年8月的大灾难铺平了道路。这些缺陷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缺乏全面了解；拒绝在议会之外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10年，罗莎·卢森堡曾徒劳地主张这样做）；缺乏革命远见；以及在后来暴力行动变得不可避免时，缺乏对渐进主义策略作出修改的能力。

但是，以上这些缺陷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国际准则的约束以及没有把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付

诸实现的传统，则肯定属于引起1914年7月底主要社会主义政党惊人转变的基本原因之列。

列宁指出，第二国际破产了，必须在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
治基础上建立第三国际。当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持此看法。
罗莎·卢森堡和不少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的“温和”多数派也都接
受了下述观点：“国际是我们唯一的祖国”；在革命工人运动中应当
实施国际准则，至少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应当如此。^①这样的看
法并非十月革命——正筹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取得了优
势——的产物，亦非列宁把“俄国式的组织观念”推广至全世界的
欲望的结果。它是1915年以来所有的国际主义者——不管是否布
尔什维克——的共有的观点。它是对1914年8月冲击欧洲工人运
动的大灾难的几乎一致的反应。

但是又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与一个关于帝
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向着国际化发展的较为正确的理论观点相
一致。1914年以前，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下，世界革命
的概念已经流行起来了。不过，它是含含糊糊的，就象人们对
1848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回忆一样；或者说，人们充其量不过把它
看作是一个将革命从一国扩展到几国的趋势而已。^②而如今，在
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日益明显地形成一个有机的、矛盾的统一体
的时候，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具有现实性的问题了。

几乎所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正确地抛弃了认为革命会

① 在由罗莎·卢森堡起草的、1915年春天在“国际派”（后改称为“斯巴达克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论国际社会主义党的任务》中，有这样的话：“国际是无产阶级组织组织的中心。和平时，国际在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如何庆祝“五一”节等问题上为各国支部决定应采取什么策略。在战争期间，要由它决定的策略问题甚至更多。执行国际的决定是超过无产阶级组织其它一切义务的最高义务。各国支部如果不执行国际的决定，便是将自己排除在国际之外了。”卢森堡进而写道：“社会主义国际是无产者的祖国，捍卫它比什么都重要。”——作者注

② 就是这样，考茨基曾正确地预言，俄国1905年的革命会在东方国家中引起一连串革命。——作者注

在世界上一切主要国家同时发生的乌托邦式的观点（在激进的外表下，这个观点实际上为改良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提供了拒绝在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允许的情况下，为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借口）。但是他们也明白必然要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即革命在一国或几国获胜后会遇到资产阶级发起的国际干涉，包括军事干涉；在其它国家里，反革命会暂时取胜，从而使暂时处于孤立地位的获胜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矛盾大大激化；随着革命与反革命在不同国家里取得胜利，各国阶级斗争愈演愈烈；这种阶级斗争会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期和长期的周期性发展造成影响，而周期性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阶级斗争本身发生影响。他们还知道，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主要是，但并不只是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冲突，必然也会卷入这场混战之中。

为了解决国际阶级斗争这个复杂的现实情况，即世界革命的现实情况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殊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共产国际才在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建国际，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观点，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现实的、内容广泛的理论，而不是“把列宁的组织观点做国际范围的推广”的副产品。十月革命以来六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正确性。这一理论是1917年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实基础。托洛茨基的功绩仅仅在于：他在其不断革命理论的第二部分中对这一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阐述。^①这一理论

① “在一国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与国家的框框再也不相容了，这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发轫于国家范围之中，发展于国际舞台之上，而要在全世界完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便成为不断革命。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更新鲜、更广泛的意义。新社会在全球取胜之日，方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时。”“既然资本主义造成了一个世界性市场、世界性的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分工，也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一个全世界性的经济。”（《不断革命及其结果与展望》，1970年，纽约，第279页）。——作者注

至今还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斯大林与以他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干部中的多数派，于1924年极大地破坏了这一理论基础。当时，他们突然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①同样，这一转变的根源显然也不在思想方面。它不在于某个人的理论水平或党的某些干部的政治远见的下降。这一转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它牵涉到具体的物质利益。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享有物质特权的新的社会阶层——苏联官僚集团——的出现和篡夺了政权，以及这一社会阶层与党的机关之间的寄生关系，造成了这种理论上的剧变。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基本上表现出了这个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也表达了党的机关日益增长的独揽大权的欲望。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一理论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继世界革命真正失败之后“为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提出的前景是清晰可见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上述看法是很肤浅的。^②至于国际阶级斗争的变迁、苏联的经济政策、苏联国内的社会斗争、苏共内部的政治冲突与理论争论以及共产国际的演化对这个理论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上述看法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共产国际的转变

尽管理论上的修正最终可用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来解释
(其它任何解释都是背离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为基础)

① 到了1924年初，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版中，斯大林本人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国的努力，特别是靠一个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就是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总特征。”在此书以后的版本中，这段话被修改了。——作者注

② 在这些评论者的著作中，可以看看爱伦斯坦的《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1975年，巴黎，第64—65页。——作者注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修正一经出现就不会具有相对的自身的动力。“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被接受，确实造成了震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远的影响。绝大多数坚定的和诚实的共产党干部在1924年、1928年或1934年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证明，任何思想体系，甚至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分析方法，也难以立即把握住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在社会中的意义。这使得团结在列夫·托洛茨基周围的共产党少数派显得更加可贵；他们当时几乎马上就看出来，这个剧变会产生多么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理论的被接受，引起了五个转变。这些转变给予了共产党与第三国际的理论、战略和组织以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当时世界上所起的实际作用。

这五个转变是：

1. 接受这一理论意味着修正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的思想及其有关的观点。这又必然会导致修正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理论。

2. 由此，在保卫孤立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以及保卫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与保卫国际革命之间的关系上，又引起了一个同样带根本性的修改：保卫“堡垒”被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头等任务。这个任务越来越要求人们使国际革命的利益从属于（所谓的）保卫“堡垒”的利益。

3. 国际革命降到了这种从属的地位，又引起了一个转变：各国共产党从为推翻本国资本主义统治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共产国际从一股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变成了主要是为了保卫苏联这一堡垒的工具。这一堡垒日益强迫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自动调整它们的策略，以适应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不断变化。

4. 这种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的“国家救世主义”(实际上,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①,因为只有认为苏联、苏联无产阶级和苏联共产党对全人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能为这种系统的隶属关系辩解。在斯大林时代起着如此重要作用,以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又力图从斯大林主义废墟中挽救出来的“领导国家”和“领导党”的概念,便是从这一小资产阶级救世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在组织上,那些概念引起的必然结果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内部如铁板一块;一切讨论和批评意见,凡能打破沉寂、危及“领导国家”的领导人利益的意见,都遭到了禁止;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官僚化的副产品,共产国际也官僚化了。

5. 正是上述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堕落,破坏了第三国际及其纲领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必然要导致第三国际的瓦解。各国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只是在物质上依赖于莫斯科时,或者在展望本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中期前景而看不到别的出路时,才盲目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越来越明显,那些命令不符合它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不符合它们本身机构的利益。)^②

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变化,斯大林的“一块铁板”就迟早会象纸板一样被毁坏。苏联共产党的“国家救世主义”会使在物质上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强大的共产党都实行“救世主义”。“一个中心”必将让位于多中心。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保卫苏联堡垒”相等同将导致“民族共产主义”的泛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被接受之日起,它就为欧洲共产主义在将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托洛茨基以他那

^① 这种提法为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及其结果与展望》一书中所用。同上书,第280页。——作者注

^②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篡权以及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三十年代,对各国共产党的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注

预言家的天才看出了这一点，并在一开始就宣称：

“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工人们：除非开展国际性的斗争，否则，就连他们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所做的斗争也不会成功。而现在，凭一国之力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的理论突然出现了。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一击。凭一国之力或是在一国范围内是不能达到阶级的基本目标的，即使是较为局部的目标也不能达到。这一坚定的信念正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核心。假如最终目标能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在一国范围内实现，那么国际主义的支柱就崩溃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实现的理论，破坏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仍在通往政权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如何及以什么方式取得政权，完全取决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国的任务还是国际性的任务。如果社会主义完全可能在一国内实现，那么，人们不仅在取得政权之后，而且在取得政权之前，也可以相信这个理论了；这就是说，假如社会主义能在落后的俄国一国范围内实现，那就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也可以在先进的德国实现；那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许明天就会来丰富这个理论。纲领草案允许他们这样做。后天就会轮到法国共产党了。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社会爱国主义路线堕落下去的开始。不管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它满心以为它的国家具备了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充分’的先决条件，它便会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了；后者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个诺斯克的，但是，它却于1914年8月4日在这同一个问题上跌了致命的一跤”（《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1970年纽约版，第71—73页）。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转变

共产国际由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变成了苏联官僚集团推行其